

• 林成西 著 •

二十
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

村落变迁

江家堰村调查

一九九二年蔬菜收入

2月17日(菜地)	青笋	220斤	每斤0.26元
25日(田头)	牛皮菜	23斤	每斤0.26元
24日	米	28斤	每斤0.26元
3月7日	牛皮菜(田头)	141斤	每斤0.26元
3月8日	刘光树家的儿子受装灯	受装灯	受装灯
3月10日	牛皮菜(田头)	150斤	每斤0.26元
4月1日	牛皮菜(田头)	270斤	每斤0.26元
14日	——(——)	190斤	每斤0.10元
15日	——(——)	16斤	每斤0.88元
16日	——(——)	100斤	每斤0.88元
16日	青笋(菜田)	127斤	每斤0.16元
17日	——(——)	289斤	每斤0.16元
18日	——(——)	283斤	每斤0.14元
19日	——(——)	168斤	每斤0.14元
19日	红苕	102斤	每斤0.15元 15.2元
21日	牛皮菜(菜田)	190斤	每斤0.10元
21日	包	35斤	每斤0.70元
21日	青笋(田头)	277斤	每斤0.10元
21日	——(——)	280斤	每斤0.08元
21日	——(——)	285斤	每斤0.10元
22日	——(——)	290斤	每斤0.12元

四川出版集团



D 67
7-c₂

• 林 成 西 著 •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 村 落 变 迁

—— 江 家 堰 村 调 查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村落变迁——江家堰村调查/林成西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6. 10

ISBN 7-80659-926-6

I. 2... II. 林... III. 村落-社会调查-调查报告-成都市 IV. D67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3189 号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村落变迁——江家堰村调查

林成西 著

责任编辑 黄云生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28)85011398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1

字 数 260 千字

书 号 ISBN 7-80659-926-6/D·19

定 价 2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作为农民的私家账本，是了解近半个世纪以来成都近郊农村农民生存状况及农村社会生活变化的珍贵的原始资料。



江家堰村的3位村民分别保存的家庭账本，一共有12本。这些账本的时间上起1966年，下迄2006年，内容几乎涵盖了农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1966年工分表

日期	做什么活	时间	应得工分	合计
元月 8日	挑沙子、挑粪子	一天	7	分
元月 9日	挑粪子、修路	一天	11	分
元月 17日	修路	一天	9	分
元月 17日	修路	一天	7	分
元月 28日	修路	一天	2	分
元月 29日	修路	一天	8	分
元月 30日	挑红沙	半天	5	分
元月 31日	挑红沙	半天	5	分
二月 5日	打泥地	一天	6	分
二月 6日	打泥地	一天	6	分
二月 12日	挑粪子	一天	12	分
二月 18日	挑粪子	一天	8	分
二月 19日	挑粪子	一天	8	分
二月 20日	挑粪子	一天	8	分

村民林大友从1966年1月8日开始记录家庭收支账目和工分数量，一直坚持到1989年5月24日，中间从未间断，记录的时间跨度长达21年。对金额的记录准确到每1分钱。这是林大友1966年1月在生产队劳动内容、劳动时间和所得工分的记载账目（局部）。

1969年1月家庭支出账目（局部）

12月 30日	买烟、打丸机	2.64元
12月 31日	猪肉	1.37元
1969年元月初	1968年年终结账	504.4
1月 1日	检修、买修路费	2.71元
1月 2日	买肉	2.00元
1月 8日	检修	0.60元
1月 9日	钉靴子	0.80元
1月 10日	送礼	2.00元
1月 11日	买米、买石	2.20元
1月 12日	买柿子烟	1.05元
1月 14日	检修、买电池、饭	5.26元
1月 15日	买肉	1.24元
合计		3870.元

村民林大友1969年1月的家庭支出账目（局部）。其记载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物价水平。

1994年蔬菜收入日记

4月16日	老菜	165斤	0.70	115.5元	2.20元	420元
4月20日	小菜	160斤	0.45	72元	9.39元	70元
6月9日	老菜	127斤	0.70	88.9元	10.31元	67元
6月10日	老菜	188斤	0.70	131.6元	10.31元	118元
6月28日	老菜	256斤	0.60	153.6元	37.03元	
7月1日	老菜	284斤	0.60	170.4元	34.88元	
7月18日	老菜	38斤	0.70	26.8元	8月10日	老菜
7月19日	老菜	60斤	0.70	42元	8.31元	50元
7月20日	老菜	158斤	0.70	110.6元	9.51元	117元
7月23日	老菜	51斤	1.00	51元	9.60元	215元

村民冯达春从1984年开始记账。非常可惜的是，就在我采访冯达春之前不久，他刚刚把1984年至1993年长达10年的账本当作废纸处理了。保存下来的是1994年至2006年的账本。冯达春记录的重点是蔬菜的收成和价格变化情况，目的在于掌握市场规律，提高种菜效益。

一九九一年栽培时间记录

2月27日至3月1日	(农历正月十二)	三分自留地	生姜	470斤
3月4日至5日	(农历正月十八)	田头	生姜	150斤
3月22日至23日	(二月初八)	田头	生姜	255斤
3月24日	(二月初九)	坡地	生姜	255斤
3月26日	(二月初十)	麦田	生姜	260斤
7月10日至12日	(五月初六至八月初一)	麦田	草白	2300斤
7月28日至	(六月初七)	三分地	草白	2000斤
8月2日	(六月初八)	坡地	蒜子	110斤
8月9日	(六月初九)	田地	水白和	一袋
8月15日	(六月初二)	水白和	一袋	芥菜地
8月19日	(七月初一)	水白和	一袋	芥菜地
8月1日	(七月初二)	麦田	一袋	红和
8月20日	(七月初一)	水白和	一袋	红和

村民冯达忠从1990年开始记账。他记账的目的除了摸索市场变化规律，还在于学习蔬菜种植。因此，除了记载蔬菜收成和销售价格，还详细记载了蔬菜种植情况，包括每种蔬菜种植的地块、下种的时间（阳历和阴历），下种数量等，以便对照收成情况总结生产经验。



“江家菜地”打造区内经过装修的农家小院，面貌焕然一新。

“江家菜地”的配套项目“农业文明记忆馆”。该项目整体面积为12亩，主展馆建筑面积达 2359.44平方米，为两层建筑。展馆主体建筑外形颇似犁头，象征传统农业文明。



村民冯达春的小楼和庭院

“江家菜地”打造区以外的部分，仍然保持农村的原生态。与打造区相比，一村两貌的特点非常明显。



序：来自社会底层的口述历史

谭继和

本书作者说他的书是“以村庄为对象的微观史学著作，主要采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尽可能从农民的视角来描述农村的发展变化”，这句话正说明了本书最重要的特色。它是一本口述历史著作，是一本从“口述史料”层面提升到“口述历史”层面的佳作。目前，口述历史及其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但有关口述历史的相关概念，学者之间认识不同，分歧很大。什么是口述历史？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有何区别？最近，左玉河同志《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一文对学者之间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作了评述。目前多数学者根据美国唐纳德·里奇“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式搜集口述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的定义^①，认同“口述历史”就是“研究者基于对受访者的访谈口述史料，并结合文献资料，经过一定稽核的史实记录，对

^① [美]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

其生平或某一相关事件进行研究，是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复原”^①。但正如唐纳德·里奇一再声明过的：“口述历史是一块极富创造力与活动力的园地，无法以单一的定义来界定、掌握。”^② 上述多数学者认同的定义，虽然力图区分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界限，却又恰恰陷入了“单一性界定”的泽地，因而目前国内大多数所谓“口述历史”出版物，实际上都只是口述史料的记录，并未进入“口述历史”的层面。依我个人的见解，从未来口述史发展的趋势看，如果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应包括“口述史料”、“口述历史”、“口述史学”三个层面。“口述史料”是当事人的“记忆”的记录（既包括访谈者的记录，也包括受访者自身以“记忆”形式写作的“记录”）。“口述历史”是指受访者根据口述史料而用“论从史出”的方法加以一定理论提升和逻辑推理的史学著作。“口述史学”则是对口述史的性质、范围、原则、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研究的理论著作，也即“口述理论”。用这个标准来看，本书作者以一个村庄的农民为口述对象，以坚韧的毅力和长达三年深入农村基层的访谈实践，获得了“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双收获。这让我对上述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有了更为清晰的思考。我相信读者细读本书，还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进一步说，令我饶有兴味的是，《江家堰村调查》这本书，既是史学研究走向新潮流的产物，又是向历史学原生态回归的结果。

① 左玉河：《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载《新华文献》2006 年第 16 期。

② 〔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

我们知道，口述历史的核心是“记忆”，是能够被提取和保存、能够发挥研究效应和社会公众效应的“记忆”。口述史早在上世纪40年代即被古尔德所提倡，但它的高潮的兴起，却是由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数字化时代”的推动。它使传统主流史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质的变动，其新趋势是“从主流历史学的学术研究转向对记忆的研究”^①。从本书的性质看，本书是口述历史的全球化新浪潮中的一朵值得珍视的浪花。作者自身也以自己踏实的业绩，加入到了口述史学工作者的行列，这是一个特殊的“史学界唯一专门和活人打交道的历史学家”^②的群体，现在正日益发展起来。

说本书是向历史学原生态的回归，这是因为历史学最初就是从口头历史开始的。这一点，目前学者之间有争论。不过，早在文字出现以前，原始部族已有口传的首先是祖先的历史故事，这却是事实。从殷周以来就有巫史，有“右史记言，左史记事”的传统。“记言”的史官，就是最早的口述史工作者。1773年，著名英国学者约翰逊就认为：“所有的历史最初时都是以口述的形式存在的。”^③《史记》的《游侠列传》就是司马迁根据访谈记录而写的“口述历史”。宋代时已有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记述两种区别。前者被叫做“史底”，后者被叫做“本事”。如蹇驹《采石瓜州晁亮记》，其语体本是当时采石一战刚结束时，蹇驹“获侍燕（宴）间，闻是事甚详”而采访的记录，实即“口述史料”，当时叫做“史底”。后来，他又加工整理删削为文言体本，叫做“本事”，这就是“口述历史”了。应该说，中国自西周以来就已

① ② ③〔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

有“记言”的口述史料与“记事”的口述历史并行的传统，这是中国史学的原生态，只是当代我们学者还未重视罢了。因此，借本书的出版，宣传一下向历史学原生态传统的回归，希望有更多的人重视“口述史”，这还是有好处的。

本书以“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村落变迁”为题，正表明它的重心是专注于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尤其是乡村生活。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当前的口述史，以要人、要事、决策、重大功过、社会热点为题材的居多，而以社会生活为题材，以普通民众为中心人物的还不多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计划采集普通民众的口述史料，也仅是开始阶段。美国和中国台湾出版的口述史则多为军政要人。因此，转向以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作为口述史重点，实是历史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的需要，“是将麦克风交给人民的时候了，是该让人民来说话了”^①。本书选择了“三农”问题这个尖端课题，深入到乡间村落、酒肆茶坊、菜地农家，采访农夫、菜农、粮农、商人、老幼妇孺，并发掘出农村家庭 40 多年记载不间断的生活账本，又是植根于成都平原这块肥壤沃土上，这简直是弥足珍贵的发现，是口述历史方法探索的珍贵实践。目前还没有一本全面探析成都平原如何走向新农村建设的曲折道路的著作，本书对此是一个贡献。农村改革走到今天，面临新的路径选择。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成果如何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直接关系到农村未来的发展。“解决‘三农’问题难度很大，任务艰巨，但也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温家宝总理语）这靠空洞的理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靠的是实践，农民

① [美]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

的生活实践，包括理论工作者贴近农村生活的实践。城市化与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城乡一体化是这一进程中一个新阶段的产物。“城乡一体化”，不应该是农村城市化，也不是城市乡村化，而应是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化。马克思曾经指出过两种城市化的途径：一种是日耳曼的“乡村城市化”，造成了城乡的尖锐对立。一种是古代东方社会的“城市乡村化”，城市就是自然经济为主体的有城垣的农村，农村与城市有天然的联系，造就了一个个城乡生态和谐发展的“田园共和国”的城市。我们国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成都平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农民如何融入现代社会，城市化的优越性如何，其消极负面影响有没有，新农村建设可选择什么样的模式，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运动中得到解答。而这种解答，存在于农村和农民以及农业产业的生动实践和日常农村生活之中。我们需要直接听一听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声音，需要倾听农民的回顾、呼喊和欲望，倾听他们对深化改革的诉求，那么，就请从本书里“观”——“观”农民的“世音”吧，这里就不再饶舌了。

2006年9月10日于锦城

走进“66 万分之一”

（前言）

—

2006 年，全国农村有 66 万个行政村^①。

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三圣街道办事处（原三圣乡）的江家堰村，就是这 66 万分之一。与全国农村的整体相比，江家堰村可谓沧海一粟。

这沧海之一粟，正是本书关注的对象。

江家堰村是成都近郊一个极不起眼的村庄，甚至在成都市地图上也找不到它的名字。这个村是成都近郊已经为数不多的农业村之一。直到进入 21 世纪的最初几年，这个村还没有进入开发商的视野。我在 2004 年选择江家堰村作为调查对象时，它仍然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除了附近区域的居民，那时大多数成

^① 据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 年 04 月 06 日 14:28《高层访谈：全面理解新农村建设的“20 字目标”》披露的数据。

都人还不曾听说过江家堰村。

本书以江家堰村为对象，从微观史学的角度回顾这个村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历程。试图通过考察社会转型时期一个村落的变迁，对探讨产生“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由来有所裨益。

关注沧海之一粟，目的在于关注沧海。

时至今日，“三农”问题已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当初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一举扭转了长期困扰中国的农产品短缺局面，在那几年，农村捷报频传，亮点不断，农村曾经是全社会关注的中心。在人们的印象中，由于家庭承包制的实施，似乎中国农村的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于是全社会的注意力便逐渐从农村转向了城市。

在随后的时间里，由于农村一直持续不断地向社会提供越来越丰富的农产品，城里的人们餐桌上的食品越来越丰盛，于是城乡二元分割问题、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国家对农村和农业投入不足的问题，以及农民增收困难等等问题，往往就被社会所忽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些问题和矛盾逐渐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这才吃惊地发现，“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继续发展的“瓶颈”。

当人们意识到“三农”问题的难度远远超过想象的程度，当人们为破解“三农”难题而苦苦思索时，必然会合乎逻辑地发出追问：这些问题是如何形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是以向前看的心态，将目光投向未来，一路开拓前进，我们几乎无暇顾及留在身后的轨迹。当改革过程中积累的问题到了不解决就难以继续前进的时候，当我们面

临重大的路径抉择的时候，我们才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所走过的道路，去探究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为的是从以往的轨迹中去发现规律，去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

当我们重新关注农村问题时，自然也就需要重新审视和反思农村改革以来的历程。

要研究大海的水质何以成为今日的状态，有一种办法就是提取一滴海水加以分析。

这也是本书所采用的办法。

二

我在2004年之所以选择江家堰村作为调查对象，是基于如下理由：

1. 该村虽然地处成都近郊，但由于其特殊情况（距成都东郊火葬场较近），过去一直是开发的盲区，乡镇企业发展水平也不高。该村至今仍主要以种植农业为主，具有传统农业村的一般属性，也具有“三农”问题的一般特征。

2. 该村位于成都东郊，正好在成都城市向东发展的战略方向上，处于城市化的前夜。该村的发展轨迹，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传统乡村向现代乡村转化的全过程。

3. 该村属于成都东山客家人聚居区。清代以来，东山客家人一直保持较为浓厚的客家习俗和较为特殊的社区亚文化。以该村为研究对象，除了可以具体考察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下农村传统经济文化所发生的变化，还可以考察客家文化在这个过程中的传承和演变状况。

就在调查的过程中，江家堰村在最近一两年内开始出名。这是因为该村的一部分被打造为“江家菜地”。这是一种新型的乡村旅游模式。“江家菜地”与锦江区的其他 4 个乡村旅游项目合称“五朵金花”，并在全国乡村旅游领域中逐渐崭露头角。

时至今日，江家堰村除了局部被打造为“江家菜地”，还有大部分仍保持传统农村的面貌。一村两貌，现代模式与传统模式并存，正好对照观察。并且也为探讨如何推进城乡一体化，有效地促进农民增收，提供了一个可供实证研究的对象。

对江家堰村的调查表明，这个过去长期不为人注意的村落，竟然是一座资料的富矿。关于农村改革前后农民生存状态的资料，关于城乡二元体制制约农村发展的资料，关于传统农业向商品性农业转化的资料，关于近年来城市扶持农村的若干模式的资料，以及关于农村风土民俗的资料等，几乎应有尽有。这些资料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农民的口述材料，另一类是农民的家庭账本。其内容之丰富、之具体、之生动，远远超过预期，非始料之所及。

在江家堰村，每走进一座农家小楼与村民促膝交谈，便走进了一座资料库，也就走进了一户农民的内心。交谈得越多、越深入，便越深切地感受到，这些如果平时在菜市场在建筑工地在劳务市场见到却难以引起我们注意的农民，不仅和我们一样也有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也有丰富的情感世界，而且对农村问题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这些农民从自己的视角观察和回顾改革以来农村的发展历程，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评说改革以来农村的变化，思考当前农村面临的各种问题。在他们质朴的语言中，一些关于农

村问题的抽象概念变得具体而丰满，许多看似平淡无奇甚至枯燥无味的农村生活情景变得鲜活、生动，使人如同身临其境。

他们对当前农村面临问题的思考，往往一语中的，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对于深化农村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细节性的问题，考虑之周密，非个中人所不能，为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所不及，给人以极大的启迪。

在江家堰村，我还意外地发现了一批家庭账本。这些分别来自3个农民家庭的账本共有12本，记账的时间上起1966年，下迄2006年，前后达40年，时间跨度之大，令人吃惊。并且其间基本上没有出现断档。（其中一位村民就在接受我采访之前1个多月，刚刚把1984—1993年长达10年的账本当废品卖掉，着实可惜。不过另外2位村民的账本弥补了这段时间的空缺。）由于账本在时间上的连续性，极为难得地记录了自1966年以来至今江家堰村农民生存状况的变化。

这些账本的内容，包括对家庭每一项收入和支出的记载；对自己和家人在生产队出工的时间和所得工分，以及参加的具体劳动的记载；对每一块承包田栽种农作物的种类和数量，对使用肥料、农药品种及数量的记载；对每一次出售农副产品的数量和收入现金的记载；对修建房屋时购买材料的费用和工钱的记载；对送礼收礼等人情往来的记载；对结婚宴席所用的各种食品及烟酒数量和金额的记载，以及亲戚邻居之间互相借贷情况的记载等。这些内容几乎涵盖了农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账本实际上是内容丰富、具体而微的关于农民生活状态的实录。

出自不同村民之手的账本所记的内容各有侧重；出自同一村民之手的账本在不同时期记账的要点也有所不同。农民的私家账